



面向新发展格局的『十四五』教育

□马陆亭

观搞活”。“宏观有序，微观搞活”是系统科学的重要成果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呈现形态。2019年，我国初中阶段、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达到102.6%、89.5%、51.6%，今天的教育已全面进入到普及化阶段。由发达国家过往的历程看，从精英到普及化教育，教育发展的关注点会逐步从提高入学机会、质量保障转向内部衔接的灵活性及与社会的适应性，终身学习体系构建、资源配置、实施方式及推进机制愈显重要。百姓观念在从“有学上”向“上好学”转变，民族复兴需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人才培养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，素质教育需要全面推进。为此在制度政策上，需要推动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，以完善学校教育结构体系为基础，社会教育、家庭教育全面建设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；需要推动东中西部教育协同发展，发挥体制优势激发各个教育组织活力，面向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建设，面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，点线面多层次加强教育相互支援与合作，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提升教育服务水平；需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，注重教育体系内部及学校学习与社会经历的联系与衔接，加强学分银行建设，推动形成“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时时可学”的学习型社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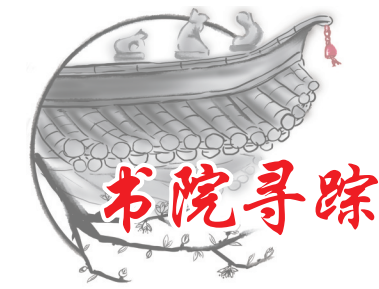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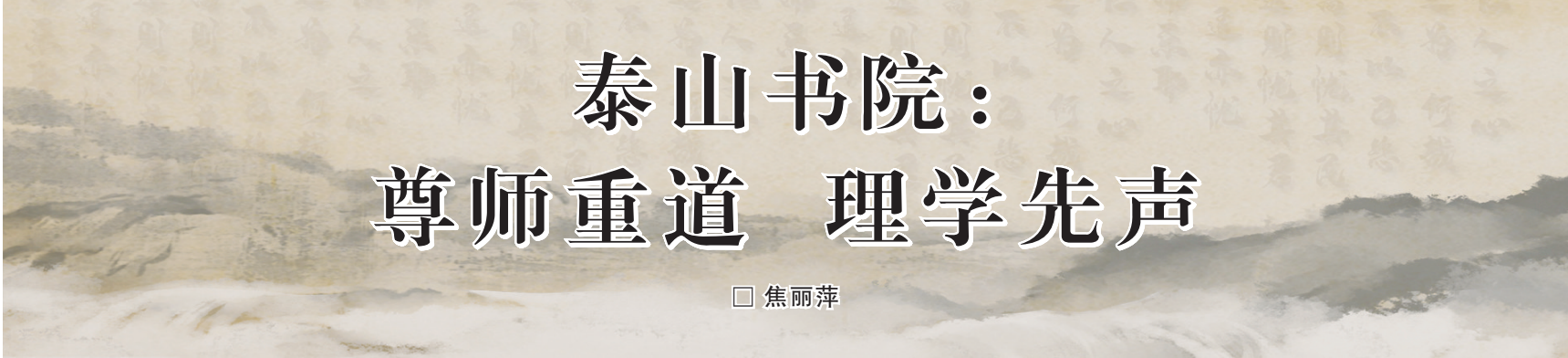
其三，抓本质内涵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。新时代是各级各类教育都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时代，所谓内涵式发展就是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发展，抓本质内涵就是让学校、教师在微观行动层面释放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活力。在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整体版图上，基础教育是青少年走出家庭、学习本领的底基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通向社会、获得才干的双车道，继续教育是融合工作、提升赋能的营养剂。我们是后发型大国，创新和应用一样都不能少，创新是发展的核心动力，应用是运行的血管血液。不同学校要在特色发展上下功夫，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找准自己的办学定位，在知识传授、思维开发、技能训练的匹配关系上实现自己的育人目标，评价改革要针对不同学校的本质内涵有所侧重。

其四，抓开放布局，推动学术交流合作。我们应该看到各国比较优势存在、创新降低成本趋势存在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要素。高等学校要主动关注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变化，了解不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特色，分析知名大学的一流学科分布，积极作为，广交朋友，拓展多国合作，用更多智慧来推动学术交流，助力国家开放大局。

其五，抓改革创新，推动教育事业与时俱进。唯改革者进，唯创新者强，唯改革创新者胜，抓改革创新就是要善于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不断开创教育发展新局面。教育工作的基本内涵是办学和育人，办学要牢牢地扎根中国大地，探索创立自己的模式，在服务国家、社会、人民中完成从学习借鉴到形成自我特色的模式转换；育人即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人才培养不仅要以德为先，还需要能力为重，这样才能担当起时代的重托和历史的重任。要注重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模式变革，积极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，对已经开始的教学模式变革、正在发生的办学模式变化、将要迎来的治理模式挑战给予充分的关注，重视智能自适应教育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。推进开展提高效率、激发活力且固基强本的综合改革，防范重大风险，加强战略和系统思维，注重改革的整体性。

在教育工作的诸多议题中，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责任更为重大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任务更为迫切，对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带动作用也更为突出，更加需要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中面向世界科技前沿，在坚持自身特色中开拓产业方向，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培养创新人才，在推动开放办学中提升国际影响力。

（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

泰山书院创建于宋景祐二年（1035年），位于东岳泰山凌汉峰下。这里古树参天，溪流潺潺。书院旧址所在的五贤祠里，祭祀着石介、孙复、胡瑗三位宋代理学的先驱，史称“宋初三先生”。三位先生都曾在泰山这个钟灵毓秀之地读书或讲学，创立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和安定学派。其学说上承孟子、韩愈，“不惑专注，自寻义理”，下启程颢、程颐，开理学之先声。

石介、孙复、胡瑗同为范仲淹门生，后来又长期在国子监共事。石介，字守道，山东泰安人，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他在宋天圣八年中进士甲科，历任郢州、南京推官，国子监直讲，回乡时在徂徕山教授《周易》，闻名山东，世称“徂徕先生”。在南京为官时与到访的孙复一见如故，相互引为知己。孙复是山西临汾人，年轻时拜范仲淹为师，学识渊博，石介十分推崇他的学问，将其比为管仲、晏婴，后两人携手创建泰山书院，开创“泰山学派”。

胡瑗，字翼之，北宋著名教育家。他年少时在泰山游学，十年不回江苏老家。据说为专心读书，收到家信后见有“平安”二字即投入涧中不再看，泰山“投书涧”景观由此得名。后来他学成回到江苏主持苏、湖府学，创立“安定学派”，世称“安定先生”。

选址泰山 开宗立派

泰山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

要的地位。清代史学家、文学家全祖望曾言：“宋世学术之盛，安定、泰山为之先河，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。”

作为儒家道统的坚定维护者，石介于景祐二年冬在原籍奉符（今山东泰安）筹建书院。他仰慕孙复的学问，请孙复主持书院教学，自己甘愿作为门徒。

起初书院建在泰安岱庙的汉柏院，名曰信道堂。不久，该堂被并入岱庙，二人又到泰山南麓、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的栖真寺，在那里修整房屋、招收生徒，讲授孔孟之道，这就是“泰山书院”。

孙复后来虽成一代大儒，但那时他还只是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。石介钦佩孙复的才学，拜其为师，执弟子礼甚恭。孔子后裔孔道辅听闻后亲自前往，看到孙复讲学时，石介执杖侍立在侧，“升降则拜扶之”。由于两位创始人的亲身践行，尊师重道在书院蔚然成风。

重塑学风 为国育才

北宋开国初期，刚刚结束五代十国的战乱，教育荒废。加之自魏晋以降，士子沉迷玄论道，“师道之不传也久矣”。石介十分推崇韩愈，重视师



中国的茶文化兴起于唐而大盛于宋，茶文化借其清雅的特质成为文人雅士崇尚田园山水、恬然淡泊的生活情趣的寄情之物。中国历代诗词人皆有描写茶的佳作，简称为“茶诗”，诗与茶结缘，茶助诗情，诗添茶趣。

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作为中国诗词文化和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，茶诗诵茶事清雅，记生活闲适，悟处世哲理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族性格，增强民族凝聚力，推动中国茶文化“走出去”。

诵茶事清雅。文人饮茶有很多讲究，讲究环境之雅，茶伴之雅，还讲究饮茶的高雅闲适的情趣，借茶的淡、洁、清、雅来抒发自身对平淡自然心境的向往之情。

宋人饮茶重视自然之趣，多在花间月下、幽台竹边。北宋晏殊《煮茶》一诗即云：“未向人间杀风景，更持醪醑醉花前。”南宋方岳《赵龙学寄阳羡茶为汲蜀井对琼花烹之》诗亦言：“三印谁分阳羡茶，自煎蜀井淙琼花。”邹浩《同长卿梅下饮茶》一诗则进一步赞颂了对花饮茶的高蹈脱俗之趣，诗云：“不置一杯酒，惟煎两碗茶。须知高意别，用此对梅花。”梅品高洁，为诗人所钟爱，茶性亦洁而清，诗人不以酒而以茶对梅，高情雅趣不言而喻。《寒夜》也表达了同样的

《寒夜》也表达了同样的高标雅韵，诗云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在雅致的情调外营造了白居易“红泥小火炉”的温馨意

境，而以茶代酒，更有一番风味。

文人还喜于自然山水之间煎茶品茗，对煮茶泉水要求甚高，他们深知新茶还须活水烹煮的道理，于是寻访名泉，流连山间，闲坐淙岩，充分享受饮茶之趣。苏轼《汲江煎茶》诗云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”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在静静的月夜，独自饶有兴致地汲水、生火、煮茶、品茗的情境，展现了一种引人入胜超凡脱俗的茶艺之美。陆游嗜茶，亦喜于涧旁泉边啜饮，其《三游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》即写他不畏山行之难，觅得一泓清潭，坐拥山色，闲饮名茶的幽兴：“囊中日铸传天下，不是名泉不合尝。”

煎茶过程也在他们的笔下妙趣横生，苏轼有一首《试院煎茶》很好地记录了宋时煎茶的过程：“蟹眼已过鱼眼生，飏飏欲作松风鸣。”“蟹眼”，“鱼眼”为用汤之法。《茶经》云：凡候汤有三沸。如“鱼眼”微有声，为一沸；缘边如涌泉连珠，为二沸；腾波鼓浪，为三沸，则汤老。此时已是二沸，若松风之声。松作为坚贞高洁的象征，为煎茶营造了雅致的意境。

记生活闲适。诗歌创作中出现大量描写日常生活的题材，其通过文人的视角与审美构架，让茶从一种单纯的自然植物化身成为高尚品格的象征，将泡茶、饮茶从简单的日常习惯发展成为愉悦身心的审美体验，实现了饮茶之举从物质性到精神性的升华，极具文人的盎然雅趣和丰富情

韵，彰显出文人雅士对茶文化的热爱以及对诗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追求。于诗人眼中，茶较静物多了清幽的醉人之味，较酒饮多了姿态多变的形态美感，较山水多了流特持久的清香气味，带动着人的众多感官感受，建立着属于茶的文化美感。

茶高雅脱俗，是山川天地之灵秀，所以茶很自然地与优雅妩媚、冰清玉洁的女性联系了起来，苏轼就有一个绝妙的比喻：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，蕴含茶叶之美；诗人还将茶比作“资质刚劲”的清白之士，称颂其“风味恬淡，清白可爱”，展现其风雅之韵。苏轼写道：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诗人描绘了初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景象，以雪与花喻茶，充溢着对生活的深厚热爱以及对自然的无限崇敬之情，表达出作者悠然淡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，带给后人以无尽的遐思。

唐宋文人喜好交游，注重人际交往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以茶待客在士庶阶层成为一种礼仪。宋代接待宾客从求见约请、迎送宾客、设茶点汤、见客服色、待客座次、宴请宾客等都有约定俗成的礼节。宋代客至设茶、辞别点汤，乃为通俗。

悟处世哲理。茶文化与古诗词的结合不仅仅是语言上的结合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相融。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时代背景使得茶诗中既有儒家清廉中庸的品性，佛家寂静淡泊的追求，也有道家返璞归真的意境，彰显出诗

国人才；治事斋实行分科教学，有治兵、治民、水利和算数4科，学生需专修一门主科，还要兼修一门副科，以培养专业人才。胡瑗提出“明体达用”的教育宗旨，为后世弟子所信奉，史称“安定学派”。

兴盛太学 开启理学

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石介、孙复先后被友人举荐，入国子监直讲，二人传播泰山书院的学术、道德，对当时的京城才子、达官贵人形成深刻影响。他们提出大学实行举人发解要有听课日限，放宽太学送考人数等主张，使国子监学生人数从起初的二十人迅速增至数千人，宋初太学由此兴盛。

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胡瑗被授予光禄寺丞、国子监直讲之职，专为太学生讲授《五经正义》。由于学识渊博，教授得法，吸引大量读书人前来求学听讲。他的弟子程颐在《回礼部取问状》中记载：“往年胡博士瑗讲《易》，常有外来听学者，多或至千数人”。

孙复、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派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僵化，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形成，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。孙复提出“尊王”之议，以明上下之分，正君臣之序；石介高扬儒家之道统；胡瑗创明体达用之学，改变了儒生治经只重训诂的习气。他们的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，并对二程产生了直接影响。

“三先生”离开泰山后，弟子们也相继出山为官，泰山书院逐渐停止授业活动，但泰山学风却得以代代流传。明代教育家李汝桂在泰山创建育英书院，继“三贤”而讲学，清代文华殿大学士赵国麟复泰山书院，后世相继落址泰山的徐公书院、岱麓书院、怀德书院等，无一不延续泰山书院的精神传统。

人对生活的热爱、对自然的崇敬，以及宠辱不惊、随遇而安、从容淡然的处世心境。

“安贫乐道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人生观。《茶笈》载：“蔡君谟嗜茶，老病不能饮，日烹而玩之。”诗人在馥郁的茶香中显示出文人豁达乐观、安贫乐道的精神。再如欧阳修言：“吾年向老世味薄，所好未衰惟饮茶。”此时的欧阳修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、大喜大悲，在茶事中寻找心灵的慰藉。

茶与文人的精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被雅化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。茶性清纯、雅淡、质朴，茶味苦而甘，味淡香永，且它生长于幽林远涧，远离尘嚣，性寒高洁，品性不移，所以文人赋予茶深厚的文化内涵、审美趣味与文化品格。《茶经》云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倡导以茶养廉、以茶励志。古代文人注重道德情操、修身养性，蕴含丰富的茶契合了他们的精神需要，所以品茶成为一种陶情怡性的过程，一种表现高尚气节的方式，一种抒发理想抱负的途径。文人对茶的感悟，提升了茶与文人精神沟通的内涵，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。

